



隐忍立名：司马迁的君子品格

□ 叶汉举



唐代刘知已曾称赞“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就明确提出对君子的认知与追求：“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太史公认为君子应当能够自我修身、乐善好施、取舍得当，尤其要能够隐忍如辱，最终树立好的声名。在司马迁丰富的君子思想中，我认为最有个性也是最核心的观点就是“隐忍立名”，司马迁以自己的人生充分践行了君子的这一重要品格。

(一)

先秦儒家有著名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的观念，其实“三不朽”的最终归宿就是司马迁再三言之的“立名”。司马迁在《伯夷齐列传》中直接感喟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有时又借助传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君子对声名的期待，如《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就曾叹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而孔子作《春秋》，以显名于后世。可见君子“立名”的重要性。而如果“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那不是君子的作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同样充满着对青年司马迁“立名”的热望！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尝显功名于虞夏”，但后世中落，司马谈因染病在身，立名无望，怀着巨大的痛苦，他在临终前紧紧抓住司马迁的双手而泣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希望司马迁能够重塑司马氏的声名。当然，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其“立名”并不仅仅是修撰一部影响深远的《史记》，而且还体现在曾经为王朝殚精竭虑，国尔忘家，意在建金石之功。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筹划在巴蜀以南建立新都，安抚了四川西昌、汉源，云南昆明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同时，司马迁作为发起人和落下阏等人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太初历》，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改变了之前《颛顼历》的累积误差。司马迁积极参与政治，关注国计民生，从精神实质而言，也是传承了先前儒家“刚健有为”的君子品格。

(二)

毋庸置疑，司马迁一生中最大的立名就是修撰了《史记》。司马迁厥初修史的重要目的是为传主扬名，称颂他们能够不拘小节，仗义而行，并且善于把握时机，以天下为己任，建立功名，流芳于世。司马迁为这些杰出人才立名首先是自己作为史官的责任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承继父亲司马谈修撰《史记》遗志的最初用意就是颂扬“汉兴，海内一统”下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旨在“绍明世”，同时也是潜在地效仿孔子作《春秋》，希望能够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故而司马迁的“立名”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政教。

当然，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之后，他观照历史的眼界更为开阔，评判更趋理性，不仅仅是将原先计划断代史的修撰改变为通史的书写，“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而且其修史的宗旨也由颂扬当代转变成为后世管理者提供国家治理上的借鉴，“述往事，思来者”，表现了超越一般史官的历史担当。更令人钦佩的是，司马迁还以历史为载体，通过史事的叙写，意在考察影响国家社会治乱盛衰、兴废存亡、成败得失的主要因素，形成最终的修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现出深邃的思想意蕴，这完全是哲学家的高度。司马迁记载的是历史，然而面向的却是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后人能够从《史记》中体察到历史成败兴坏的规律，为将来的国家治理所参鉴。总而言之，司马迁的立名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它关涉当下、关涉国家，更是融通古今，放眼未来，表现了君子为国为民的崇高责任感与深厚的思想底蕴。

(三)

当然，很少有人能够一生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往往会遇到诸多挫折。君子同样如此，如果他不能忍辱负重，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想成就自己的声名庶无可能。因为不能忍受小辱，逞一时之勇，却可能因此丧失建功立业而最终立名的机会。故而，君子“立名”需要具有“隐忍”的品格，司马迁本人就是隐忍立名的践行者。人生前期顺畅、可谓意气风发的司马迁因秉持公心，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被“吏议”为“诬上”，“深幽圜墙之中”。而“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最终选择了最侮辱人格的“腐刑”，代替了可以保持个人名节的死刑，是因为《史记》修撰还没有完成。接受死刑对于司马迁的人生来说，是“轻于鸿毛”的，最终为司马迁所放弃，而接受腐刑却使他有时间最终完成了“重于泰山”的皇皇巨著《史记》，成为后代正史学习的典范。司马迁认为君子之所以需要隐忍是因为“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可以说，司马迁的隐忍成就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著《史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司马迁这样一位隐忍负重的君子，“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因为司马迁对隐忍立名有着亲身的体验感受，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君子的成长过程往往突出其隐忍的品格。司马迁笔下的士君子往往都能做到隐忍坚定，砥行砺名。如管仲曾经跟随公子纠，公子纠与小白（后为齐桓公）争权中败亡，管仲“幽囚受辱”，后经鲍叔牙的强烈推荐，最终为齐桓公重用，成为一代名相，管仲曾由衷地感慨道：“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伍子胥也是如此，如果当初他和父兄一起含冤就死，怎会成为后来辅佐阖庐、夫差建立丰功的一代名臣！司马迁由此对君子隐忍成就功名感喟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螻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括而言之，司马迁对忍小辱、弃细行而能够树立传世之名的君子品格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也是司马迁本人的君子品格在传中人物身上的折射。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德庆学宫：古建瑰宝 化润千秋

□ 张水木 叶汉文



“江山连肇庆，云物接苍梧”。岭南古郡——德庆，地处我国南方黄金水道——西江中游北岸，山水秀丽，人杰地灵，又位于两广交通要冲之地，“扼广右之门户，维崑桂贺三江”。自秦汉以来，宦宦、商贾往来于岭南和中原，多取道湘水、漓江，经西江到德庆，然后转至东南沿海各地。

德庆建制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古称端溪县、康州等。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赵构因康州曾为其潜邸，颂其以德致庆，升康州为德庆府，德庆之名从此沿用至今。南宋名相李纲曾赋诗颂德庆云：“环抱大江流，层峦翠霭浮。神明扶王气，景物冠南州”。在这一座山水如画、民风淳朴的城市里，巍然矗立着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庙学建筑——德庆学宫。

集中古建筑工程的三个独创

德庆学宫，又称德庆孔庙，是古代德庆地方的官办学府。古代朝廷规定，凡科举者必由学校，德庆学宫就是邑学学子通往科举功名的阶梯起点。据《德庆州志》载：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诏置孔子庙”，元丰四年（1081年），学宫迁于今址，至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升为府学。元大德元年（1297年），府学教授林舜咨“筑基拆建大成殿、东西庑殿，后建尊经阁，阁下建议道堂”，扩大占地范围“五倍于昔”，后再经明、清两代官民接力维护加建，遂形成今天德庆学宫之基本规模。

岭南地区潮湿多雨，河网纵横，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岭南的建筑大都强调通风透气，防潮防湿，防洪防雷，而坐落在西江河畔的德庆学宫大成殿，就是一个典范。

德庆学宫大成殿是我国岭南地区仅存的保留了宋元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大成殿为重檐歇山灰瓦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庄严雄伟，平面呈正方形，是典型的宋元古制。据专家考证，它集中了我国古建筑工程的三个“独创”：四柱不顶、减柱四根、出昂最长。



中国古代传统殿堂的架梁方法，采用的是“八柱撑空”的木梁架结构，由8根金柱承托梁架。而德庆学宫大成殿则是采用“四柱不顶”的独特形式。所谓“四柱不顶”，是指在殿梁架不砌上露明藻，左右次间各减了两根内檐柱，明间正中只竖四根不到顶的金柱，柱顶上横架座斗枋，安放四个斗拱，以承托着压槽枋和井口天花板，天花板上再立圆柱以支撑正梁，这一设计使大殿内空间大开，内部更加高大宽敞，而且在减柱四根的同时满足建筑物防洪灾的要求。

大成殿下檐斗拱保留了宋代的结构与风格，为七铺作单抄三下昂，出跳总长达122分度，为目前已发现的唐、五代、宋、辽、金古建筑同类斗拱之冠。岭南风大雨多，阳光猛烈，采用深远的出跳，较低的檐端，既可以御风雨，保护殿身结构，又可以防止强烈的阳光辐射。

历史上，大成殿曾被洪水冲毁过，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时，在设计、用材等方面均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将殿堂台基加高至1.2米，为原基的5倍；设置了花岗石门檻；前檐柱用花岗岩石柱，其余左、右、后三面以高而厚的硬石砖墙。殿内减柱四根，极大地减少了水的浮力。大成殿重建至今700多年，其间受洪水冲淹90余次，但大成殿依然巍然屹立。

今天，设计大成殿的能工巧匠们的姓名身份已无从考证，只有他们留下的建筑瑰宝绝唱千古。四柱不顶、减柱四根、出昂最长，使德庆学宫大成殿从内部到外部造型，

在当时处于世界建筑领先地位。1996年11月，德庆学宫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岭南儒学的传播基地

从北宋到清朝，德庆学宫充分发挥了其兴学育才、尊孔尊儒的基本功能，对推进儒学和相关学术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学宫聘请硕儒明贤讲学授徒，探究儒学，钻研经术，促进著书立说，撰写和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形成了士子刻苦攻读的良好学风。从宋至清，德庆人考中进士的有18人，考中举人的114人，贡生534人，共撰写专著68部，100多卷。如宋时进士石处道，善文学、工诗赋，撰有《松江集》传世。清代晚期诗人梁修，26岁中举人，著有《锦石集》，其第六卷百花诗轰动广东省城，为世人所称道。

在德庆学宫的影响下，由大儒或乡创办的书院、义学、私塾应运而生。据州志记载，苏东坡、周敦颐、祖无择、李纲等文化名人曾到德庆游历，在当地三洲岩留下了题刻。端溪县令许鉴仰圣周敦颐，于岩畔建濂溪书院纪念，这是德庆最早的书院。到了清代，书院增加到30多所。至清代大兴试院以后，“文学日盛，侧闻岁科两试，应考者八百余人”。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举选士的兴旺，催生了一批批名宦乡贤。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但德庆学宫教育人的功能没有终止。德庆官府

回归家庭教育的本义

□ 孟 筱

会人才竞争激烈，各类业余辅导班、特长培训班等社会教育机构应运而生，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作用凸显，并逐渐渗透到教育生活的各个领域，弥补了家长在时间精力、知识能力方面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原本家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道德教化、习惯养成被社会教育机构的各类培训所取代，家庭教育内涵缺失。无论未来如何发展，社会分工如何更加专门化，每个人都是从家庭中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守规矩、学会交往，更重要的是从父母及家人那里学到了价值观和处事态度。因此，要在新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实现生命和文化的双重温暖。

教育源于生命的内在需要和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生命的成长和丰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由内而外的修行过程，内在需求不断认识和充实的过程。尊重成长规律是前提，教育的理想是依据生命本性、尊重生命独特性、促进生命发展。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生命本源，遵循身心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以“他者的思维”即用教育者的眼光衡量、审视并评价受教育者。相反，家庭要重视个体潜在的积极势能——向前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不

是外在于生命的实体存在，而是源于生命的内在需要和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不是被动地、简单地吸收和接受知识，而是在自身兴趣和内在力量的引导启发下，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实践，不断进行个体社会化。构建生命的内在秩序，使生命始终保持活力、充满想象力。

家庭要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视野的敞开。文化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生命力。家庭文化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环境，也包括家风家教、家庭成员关系、家庭氛围、心理道德环境等。向孩子传导各种社会规范，通过父母的潜移默化将伦理亲情、道德观念、风俗文化、生活制度内化为下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重视榜样示范作用，以自身文化素养提升和文化精神引领，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和好人人生第一粒扣子。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家庭文化的熏陶对其人格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同时，家庭教育还要注重文化视野的敞开。教育在家庭中往往局限于智识教育，其实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家庭里播种阅读的种子，在大自然中寻找万物孕育的真善美，在家庭成员的相互陪伴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教

于学宫尊经阁设立州立高等小学堂，在明伦堂一侧设立初等小学。新中国成立以来，德庆当地兴文教育之风未减，崇学上进之士不断涌现，其中包括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方华（1932—2020年），世界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等。

弘扬尊师重道的兴学风尚

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被尊为“万世师表”，德庆古代祭祀孔子的仪典活动肇始于宋并历代相沿，至清代臻至极盛。祭孔分春秋两季进行，春季于正月十五日，秋季于农历八月上丁日进行。

德庆学宫自建以来，历朝地方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不遗余力地推动学宫的建设发展，为德庆“人士彬彬奋起，蜚声腾茂”创设了沃土摇篮。《德庆州志·端溪县学记》中记载，明洪武年间，德庆州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促进了当地人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凡有民社之责者，莫不知兴学，而人亦莫不知务学矣”。成化年间，明代官员李质后裔，在家乡晋康金定（今德庆县九市镇辣头）设立金定社学，每年聘请名师讲学，使得李氏家族几代人才辈出，德庆尊师重道的兴学风尚得到弘扬。

由于德庆崇文重教遂成风气，化润千秋，孕育了德庆学宫祭孔活动的炽盛，祭孔仪典自宋以来一直绵延传承。进入21世纪以来，德庆县组织文化、教育等部门多方寻访、整理、研究，较为完整地初步恢复了全套的祭孔仪典，并于2001年德庆学宫修复重光庆典上举行了盛大的祭孔活动。此后，德庆每年坚持举行春秋季祭孔仪典活动。

